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媒體即身體：綠色小組與環保抗爭

The Medium is the Body: Greentea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st

doi:10.29876/ATNNUA.201212.0001

南藝學報, (5), 2012

作者/Author：蔡慶同(Chin-Tong Tsai)

頁數/Page：1-2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876/ATNNUA.20121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媒體即身體：綠色小組與環保抗爭

The Medium is the Body: Greenteam and Environmental Protest

蔡慶同* Chin-Tong Tsai**

摘要

在1980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中，綠色小組無疑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文企圖從麥克魯漢的「媒體是人的延伸」、「媒體即訊息」等等觀點出發，重新觀看早期環保抗爭的紀錄影像（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一方面我們得以看見草根民眾如何以身體作為媒體進行抗爭，另一方面我們也得以將另類電子媒體視為社會運動的一環，進一步釐清新的媒體形式是如何透過身體來實踐，並改變了既有的社會關係。

關鍵詞：媒體、身體、社會運動、綠色小組、環保抗爭

* 蔡慶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Chin-Tong Tsa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Documentary and Film Archiv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本文係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觀看社會：紀實音像與社會變遷」(NSC98-2410-H-369-003)延續至「東亞視線：臺灣、韓國與日本紀實音像之比較研究」(NSC100-2410-H-369-001-MY3)之部分研究成果，並在此感謝兩位匿名審委的修改建議。

Abstract

Greenteam played important role of alternative media movement in the 1980s in Taiwa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 to use the image archives of early environmental protest as the focal point of discussions. By applying “the media is the extensions of man” and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of perceptions developed by McLuhan, the author will look at how Greenteam has represented bodies of grassroots. Furthermore, how Greenteam has fulfilled the practice of media through bodies will also be explored.

Keywords: medium, body, social movement, Greenteam, environmental protest

壹、前言

1980年代，往往被稱之為臺灣社會運動的「風潮」，¹或「黃金十年」，²而另類電子媒體作為社會運動，身在其中也同樣地風起雲湧，首開風氣的即是在1984年所發生的海山煤礦災變，³透過鄭文堂和王智章以可攜式電子攝影機（ENG）所拍攝的紀錄影像，不僅呈現了礦工實際受害情形，更進一步挑戰了主流媒體的不實報導，尤其是許多受難家屬未領到應得撫恤金的實情。

在這第一次的異議行動之後，1986年，綠色小組正式成立，其他的電子媒體團體和個人工作室也陸續出現，包括了1987年的第三映像工作室，1988年的文化臺灣影像工作室、螢火蟲映像體，1989年的易小文、洪智育、新臺灣社連視聽工作室、多面向藝術工作室，1991年的李泳泉、陳麗貴、羅興階、臺灣報導、獨獨影像傳播公司、新生代影像聯盟等等。

早在1980年代之前，所謂臺灣的民間社會力已開始醞釀與沸騰，尤其是關於環境運動的議題，它體現在公害抗爭、專業論述與黨外雜誌，而上述另類電子媒體的出現，正好扮演了有效的傳播管道，以及適當的紀錄工具等等角色，不僅在當時對於社會運動起著推波助瀾的效用，也累積而成為1980年代社會運動的影像史。

然而，歷經1980年代的狂飆之後，進入1990年代，由於社會運動的日益沉寂，或者說是逐漸轉入馴化，⁴或制度化的模式，⁵加上解嚴後媒體言論空間跟著日益擴大，乃至在另類電子媒體的市場上面臨著競爭與仿冒等等問題，另類電子媒體未能成功地轉型，也跟著走向了沒落的過程。

¹ 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國策中心，1989年），頁13。

² 蕭新煌，魏書娥採訪整理，〈挫折與轉進—訪蕭新煌教授談兩年來的臺灣社會運動〉，《中國論壇》第32卷2期（1991年），頁58-61。

³ 臺北縣上城市的海山煤礦災變，發生於1984年6月20日，是同年臺灣的三次煤礦災變（海山煤礦、海山一坑、煤山煤礦）之一，由於臺車之間的插哨沒有插好，造成臺車滑落，又因為撞擊到高壓電，引發的火花和漫布在空氣中的煤粉接觸，引發爆炸，未在撞擊過程中喪命的礦工，也因為空氣中布滿了一氧化碳而喪命，該次災變共有74人死亡，且大多是阿美族的礦工。

⁴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轉化：臺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2期（2003年），頁57-119。

⁵ 何明修，〈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0期（2003年），頁217-275。

回顧這段歷史，當中的綠色小組，相對於其他另類的電子媒體，它無疑具有一個特殊性的位置，包括了他們總是站在同情或支持社會運動的弱勢立場，以及因為社會運動每役必與的製作方式，因而累積了全面與完整的紀錄影像，而更重要的是，基於它作為文獻檔案、歷史見證與集體記憶的認知，上述紀錄影像作為資料庫，得以被保存了下來並作了妥善的維護。

關於 1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乃至綠色小組已多有討論，然而，它們不僅多是以編輯的錄影帶作品作為研究資料，同時也大多集中於它所出現或衰落的結構性條件、另類媒體的生產形式、弱勢觀點的再現及其批判等等面向，如今，當我們將其視為影像的檔案及資料庫，透過重新觀看資料帶的紀錄影像，是否能夠進一步考掘到不同的解讀及其意義？

因此，本文擬透過重新觀看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尤其是它所再現的早期環保抗爭，企圖從身體如何作為中介的觀點，進一步去思考社會運動與電子媒體的關係，換句話說，社會運動涉及到的是意識的轉變與集體的行動，而正如在環境運動的研究領域，開始注意到身體的感受作為文化面向的重要性，⁶或者草根民衆的身體如何作為論述與運動的主體。⁷

反之，當我們重新審視 1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尤其是它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也不應該只是將其視為社會運動的紀錄，或者共識動員的工具，彷彿在社運與媒體之間，不僅是互相分立的，而後者只是真實（社運）的再現（媒體），進而因此忽略了它自身也是作為社會運動，身體也在其中，並實踐著紀錄、影像與觀看等等活動。

貳、綠色小組

關於 1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一般都是聚焦在它興起乃至沒落的結構性條件、它生產的形式乃至與社會運動之關係、它所呈現異議的內容與弱勢的觀點，然而，如果以媒體與社運之間的關係來說，我們可以發現到既有的討論，往往是將前者視為是後者的反映，因此忽略了另類電子媒體，也是以身體作為中介的社會運動。

⁶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的歷史形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8 期（2000 年），頁 133-206。

⁷ 何明修，〈臺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1980-1986）〉，《臺灣社會學》第 2 期（2001 年），頁 97-162。

一、另類電子媒體

1980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被冠之以不同的名稱，包括了反主流（counter-mainstream）、⁸替代性、⁹小眾、¹⁰另類（alternative）、¹¹異議（dissident）、地下（underground）等等，但其主要精神皆在於，它是相對乃至是對立於主流媒體、作為社會運動的紀錄者、成為弱勢團體的代言人。

針對1980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之討論，大多集中在下列幾個面向，一是結構性的條件，也就是企圖去解釋類似綠色小組的電子媒體，為何會在1986年前後出現？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媒體環境，因而使之興起？後續又由於什麼樣結構性的困境，因而使之沒落？

也就是說，在1980年代之前，由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控制體系，主流媒體皆被納入威權政體而扮演著意識形態工具的角色，自1980年代開始，則是一個從嚴密到鬆動的轉折點，包括政權內部矛盾與民間社會力量，衍生著政治反對運動和各式新興社運，而電子媒體作為其中的一環，面對壟斷的媒體環境，也同樣透過長期拍攝政運、社運的過程而有所作為。¹²

之後，伴隨著社會運動的沉寂或轉化、媒體言論的空間擴大與仿冒盜版的市場競爭，另類電子媒體也浮現並面臨著結構性的困境，後期雖力圖或者轉進商業取向、或者經營民主電視臺，但是，都由於轉型不易或未能成功的問題，最終也走向沒落一途。¹³

二是生產的形式，也就是企圖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包括從拍攝、製作到發行的各個歷程，去釐清另類電子媒體的生產形式，尤其是它們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或構成方式？它們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為何？如何進行影像的紀錄以及紀錄了什麼？如何編輯以及發行它們的錄影帶作品？

⁸ 戴伯芬、魏吟冰，《臺灣反主流影像媒體的歷史觀察》，《電影欣賞》第57期，（1992年），頁45-51；戴伯芬、魏吟冰，《臺灣反主流影像媒體的社會觀察——從拍攝內容分析談起》，收於敦誠等著，《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臺北：唐山，1992年），頁43-52。

⁹ 敦誠，「小眾媒體」是什麼？由四個國家的實例省視本地的狀況》，收於敦誠等著，《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臺北：唐山，1992年），頁3-19。

¹⁰ 賀照緹，《小眾媒體、運動文化、權力：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¹¹ 廖素霞，《臺灣社會運動與另類影帶之研究 1986-1992》，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¹² 賀照緹，《小眾媒體、運動文化、權力：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頁11-37。

¹³ 同上註，頁67-97。

就拍攝而言，它們運用了可攜式的電子攝影機，並形塑著某種高機動性、非制度化的工作方式；就製作而言，它們大多出版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錄影帶，包括了演講會、說明會和晚會的定點活動、遊行或定點的長期抗爭，強調抗爭過程中的衝突場面、運動參與者情緒高昂而足以鼓舞運動的片段、運動被鎮壓的畫面；就發行而言，則是藉由地下錄影帶的流通管道（會員制、攤販銷售點、黨部與服務處），輔以巡迴放映隊、運動進行過程的動員、電視發射臺，達到最大的動員效果與游擊戰式的影像運動。¹⁴

三是弱勢的觀點，主要關注的是另類電子媒體的錄影帶作品及其內容分析，包括由於它們兼具紀錄者和運動者的身分，乃是透過素材的選擇從而形塑自身的運動語言，以及相對於宰制性論述的弱勢者觀點，這其中包括了它們大多選擇具有時效性的議題，總是站在抗衡主流媒體、抗爭行動立場、國家機器對立的觀點。

但也因而衍生著替群眾代言的現象，包括了它們過度扮演啟蒙者的姿態，進而呈現單一化的影像語言、旁白與敘事結構，¹⁵或者像是突顯的重點幾乎全是社運領導者和幹部，能讓底層民眾可見的文本太少了，乃至於女性及其議題更是被壓抑的。¹⁶

二、媒體即訊息

無論是結構的條件、生產的形式或弱勢的觀點，就媒體與社運之間的關係而言，都有將兩者分立看待的問題，彷彿這類電子媒體只是用以反射實際的社會運動，即便是關於生產形式的討論，已呈現了它從拍攝、製作到發行的完整歷程，但仍舊忽略了另類電子媒體本身也是作為社會運動。

也就是說，如果社會運動是以身體「做」出來的，那麼，另類的電子媒體，也是經由身體而施為出來的，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另類電子媒體，如何透過身體作為中介，進一步操作出不同的媒體形式，以致於改變了媒體的意義及社會的關係，如此，透過身體、社運與媒體的接合，論述方能完整。

換句話說，在 1980 年代之前，作為被規訓的身體，主流媒體也曾是作用的機制之一，而另類的電子媒體，除了異議的內容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媒體的形式，如何透過身體的實踐，改變了自我的認知與社會的關係，而 McLuhan 的媒體觀點，包括媒體即訊息、媒體是人的延伸等等，則具備了啟發性的意義。

¹⁴ 賀照縱，〈大眾媒體、運動文化、權力：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頁 52-57。

¹⁵ 郭力昕，〈跳出大眾媒介的困局——兼論社運與媒體的矛盾關係〉，收於敦誠等著，《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臺北：唐山，1992 年），頁 127-131。

¹⁶ 賀照縱，〈大眾媒體、運動文化、權力：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頁 125-146。

首先，對於 McLuhan 而言，¹⁷所謂媒體，其定義不只是狹義的大眾傳媒，而是廣義的一切作為人類與世界發生關係的媒介物，因而包括了所有天然和人造的工具，從口語、書寫、道路、數字、服裝、建築、貨幣、鐘錶、印刷、漫畫、靜照、新聞、交通工具、廣告、遊戲與競賽、電報、電話、留聲機、電影、廣播、電視、武器、自動化……。

媒體就成為人的延伸，「因為所有的媒體，從拼音字母到電腦，都是人的延伸，……這種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是功能的一種強化作用，放大作用」，¹⁸在機械年代，我們透過媒體，在空間上延伸了我們的身體，在電氣時代，我們透過媒體，又全面延伸了我們的中央神經系統本身。

但是，「當技術延伸我們的感官之一時，文化上的一種新轉譯就開始發生，其迅疾的程度就跟這新技術的被內化一樣快」，¹⁹也就是說，如果一種新技術把我們的一種或多種感官延伸到我們身體以外的社會世界中，則在這特定文化中就會出現統攝我們所有感官之間的新協調比例。

正如 McLuhan 分析媒體的技術革命，²⁰從拼音字母的發明、古騰堡印刷術的流傳、電氣時代，每種媒體的形式都對應於感官之間的一種不同的安排，這類感知上的轉化，即每種媒體所創造的新的經驗方式，是無論節目內容如何，都會發生在使用者身上的，因此，他進而以資訊飽滿程度與使用者參與程度區分出冷（cool）或熱（hot）的媒體。

例如收音機或電影作為熱媒體，是以高解析度（資訊的充足）延伸單一感官（聽覺或視覺）的媒體，而電話或電視則是作為冷媒體，電視乃是把每個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予以延伸，主要是觸覺而不是視覺的延伸，並且是需要所有感官作最大的交互作用的，電視的本質就是強烈的參與和低的解析度。

任何媒體，也就是我們本身任何擴充延伸，對個人、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後果，都來自於我們每有延伸，或可說科技每有新發展，便為人事物導入了新的規模層級所致，因為正是媒體本身，塑造並控制了人事關聯與人類行動的規模與形式，而媒體的內容與用途雖五花八門，對人事關聯的形塑則完全無能為力。

¹⁷ Eric McLuhan，鄭明萱譯，《認識媒體：人的延伸》（臺北：貓頭鷹，2006年）。

¹⁸ Eric McLuhan，Frank Zingrone 輯，汪益濤，《預知傳播紀事：麥克魯漢讀本》（臺北：臺灣商務，1999年），頁31-32。

¹⁹ 同上註，頁284。

²⁰ Eric McLuhan，鄭明萱譯，《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因此，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體不只是承載傳達訊息而已，其本身就是訊息，而內容不是，由於我們對現實之感知有賴於資訊的結構、設計和樣式，進而控制並塑造人際聯繫與活動之規模與形式，媒體本身才是重點，而媒體的脈絡（context）更重於訊息的內容（content）。²¹

三、身體、社運與媒體

透過媒體是人的延伸、媒體即訊息的觀點，我們得以重新看待綠色小組作為另類電子媒體的性質，結合可攜式電子攝影機、紀錄影像與錄影帶載體的綠色小組，它不只是作為一種媒體，再現了社會運動的真實，更是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因其不同的形式，延伸了我們身體的感官，以及轉化了個體的認知與社會的關係。

而如果要進一步理解這個轉化的歷程，重點不只是在於訊息的內容，而是在於媒體的脈絡，包括紀錄、影像與觀看的環節，我們如何透過紀錄者的身體來實踐感官的延伸？如何透過影像的身體來傳達異議的內容？又如何透過觀看者的身體來形塑社會的關係？

因此，本文擬透過綠色小組社運影帶的重新觀看，尤其是以作為早期環保抗爭範例的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為例。

1971年設立於新竹市水源里的李長榮化工廠，於1982年擴廠，並已開始出現有關於該廠排放廢氣受罰的報導，7月，近百名農民更衝進廠房發生了第一次的暴力抗爭行動，其後，衛生署雖勒令停工但市政府未確實執行，而里民多次將水質送交檢驗皆為不符標準。

1983年9月，其廢水未經處理逕自排放到頭前溪，污染了南雅淨水場，造成新竹市曾一度停止供水，經衛生署裁決停工處分，在多次改善、檢驗之後，才於1985年9月復工，1983-1985年之間，里民多次抗議也不斷陳情，但皆無效果。

在1984年協調會所作成的決議第三點，曾說明若李長榮化工廠不遵守市政府規定，居民採取自力救濟、市政府不加干涉，1987年，李長榮化工廠寄出存證信函控告里民，導致里民強烈不滿，進行靜坐抗議，1986-1988年之間，兩年內發生了三次的圍堵行動（分別是1986年11月3日的3天、1987年1月13日的12天、1987年2月27日的425天），²²1988年4月，李長榮化工才終於停止了新竹廠的運作。

²¹ Eric McLuhan，鄭明萱譯，《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²² 林美娜，〈選我一瓢清淨水：記水源里與李長榮化工的抗爭〉，《人間》第19期（1987年），頁22-47。

而從綠色小組社運影帶的資料庫來看，與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相關的紀錄影像，共計有 20 項（表 1），²³紀錄時間是從 1987 年 4 月 25 日開始，到 1988 年 7 月 26 日，主要內容涵蓋了水源里民的圍堵行動、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的公開活動、主要人士的訪談錄影（運動領導人、專家學者、民意代表、新竹市長、環保署長等等）。

【表 1】綠色小組社運影帶資料庫與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相關的紀錄影像

編號	日期	說明	長度
0208-2	1987/04/25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成立／訪問水源里民談李長榮化工	00:37:03
0217	1987/05/02、05/03、05/11	05/02 夜訪水源里／05/03 李長榮化工吊掛儲槽車出廠／05/11 採訪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 4-1	02:02:35
0218	1987/05/12	採訪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 4-2	02:03:15
0219-1	1987/05/13	採訪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 4-3	00:29:40
0219-2	1987/05/14	鹿港居民公害之旅訪水源里	00:57:55
0219-3	1987/05/14	訪新竹市長任富勇談李長榮污染事件 2-1	00:35:40
0220	1987/05/14、05/15	05/14 訪新竹市長任富勇談李長榮污染事件 2-2 05/15 採訪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 4-4	01:18:14
0262	1987/06/18	水源里民出庭應訊	00:20:01
0278	1987/06/06	水源里第四度圍堵李長榮 100 天活動	01:11:58
0292	1987/08/13	拆除李長榮廠外石堆	00:48:03
0327-2	1987/09/20	水源里民派出所作筆錄	00:29:59
0347	1987/10/04	水源里圍堵李長榮 220 天說明會 2-1	01:56:59
0348-1	1987/10/04	水源里圍堵李長榮 220 天說明會 2-2	01:38:17
0406	1987/11/21	環保之夜晚會（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主辦） 2-1	02:02:55
0407-1	1987/11/21	環保之夜晚會（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主辦） 2-2	00:34:50
0422-3	1987/12/10	簡又新(環保署長) 到水源里 2-1	00:12:18
0423	1987/12/10	簡又新(環保署長) 到水源里 2-2	01:12:45
0443-2	1988/01/06	水源里圍堵李長榮化工廠	00:06:27
0529-2	1988/05/	水源里抗爭一周年晚會	00:23:16
0639	1988/07/26	政府在鼓勵污染？座談會（李長榮雙重地日案）	02:01:49

²³ 資料來源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音像資料保存及展示中心／臺灣歷史影像資料庫／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環保運動／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http://greenteam.tnua.edu.tw/>）。

本文首先將從社會運動研究重新發現身體的觀點切入，討論紀錄影像裡所再現草根民眾的身體，其次則從媒體是人的延伸、媒體即訊息的觀點切入，討論另類電子媒體如何透過身體實踐紀錄、影像與觀看的歷程。

參、身體的媒體化

過去關於臺灣社會運動風潮的解釋，無論是政治過程論所強調的國家控制力減弱，或者資源動員論所強調的反對運動政治資源之掛注等等，大多都是呈現政治鬆動、由上而下的邏輯，然而，晚近透過環境運動的重新詮釋，可以發現到在政治自由化之前，早已經存在各種自力救濟，甚至是包括了暴力化的社會抗爭。²⁴

一、身體的感受

首先，透過環境運動的經驗研究可知，臺灣社會在政治控制鬆動之前，就已經發生了各種嚴重挑戰政治權威的自力救濟，尤其是早期的公害或環保抗爭，甚至在 1980 年代初、中期，也已出現對於環境問題有整體性思考的行動，這包括了大里反三晃(1982-1986 年)、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1982-1988 年)、鹿港反杜邦(1986-1987 年)、貢寮反核四(1985-1988 年)等等。

其中，水源里反李長榮正是作為重要的例證，李長榮化工廠位在新竹市水源里，里名雖為「水源」，卻長期飽受李長榮化工廠排放的空污、廢水所害，經過多次的陳情抗議，政府也多次開單處罰，但業主皆無改善誠意，當地居民遂發起自力救濟進行抗爭，四度圍廠長達 425 天。

同時，由於環境運動是最能體現草根民眾的身體及其感受之變化，因此，透過環境運動的考察得以發現到，某種身體權利感受的變化，才是根本問題核心，李丁讚、林文源即以當時報紙對環境問題的報導為分析主軸，進行文化面向的歷史考察，認為草根民眾面對這些污染事實的認知與感受，其實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的轉變：²⁵

²⁴ 社會抗爭的暴力化，是早在政治自由化之前就普遍存在的（而不是特例），第一次使用暴力抗爭的是 1982 年 3 月的高雄阿米諾酸事件，接著有 1983 年 7 月的新竹李長榮化工廠、1983 年的臺中三晃，乃至各類反垃圾場糾紛。

²⁵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的歷史形成〉，頁 146。

這三個不同階段的轉變，包括了自 1970 年代初中期作為受苦的身體（生理的身體、默默承受、私下陳情請願），到 1970 末、1980 初作為受害的身體（受苦經驗受害化、公開聯合行動、要求公權力介入），乃至 1982-1986 之間作為受侵犯的身體（從語言文字到用活生生的身體來表達不滿、具體表現為集體暴力行動）。

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就成為視聽感覺的經驗資料，而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影像紀錄，使得我們得以進一步掌握草根民眾的身體如何受苦？如何將自己的身體定義為是受害的？又是如何透過活生生的身體來表達不滿？

在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影像紀錄中，草根民眾向紀錄者表示：「你如果住在這裡，你就知道艱苦了，……我們大家都是在吃毒水」。²⁶

生理身體的受苦，進一步指向受害的身體，透過紀錄影像，我們看到李長榮化工的機具與廠房，是如何一線之隔就緊鄰著農舍與稻田，且由於排放黑煙與廢水，造成灌溉受到汙染、空氣瀰漫惡臭。²⁷

受苦經驗進一步的受害化，即是能夠詮釋為何受苦的因果關係，「這個工廠造成污染，政府也沒來給它停工，老百姓到處陳情，沒辦法來忍受，最後只好來自力救濟」。²⁸

而抗爭的理由正是身體的受到侵犯，包括透過抗議布條的文字，例如像是「李長榮，請尊重別人生存權」、「金錢誠可貴、生命價更高」等等，突顯著不受侵犯的權利觀念。

二、身體的可見

其次，進一步言之，這種來自草根民眾身體認知意義的轉化，不僅才是社會力正面積極的驅動力來源，²⁹同時，社會性的身體痛苦更讓草根民眾再也按耐不住，於是被迫站出來，但是，誰才是行動與論述的主體？又是哪些社會行動者在進行這種文化解讀？³⁰

正如何明修透過文化一行動的分析，更進一步說明了環境運動在早期的發展呈現了民間社會（草根民眾）的主動性，專家學者（保育學者、反核學者）一開始是顯得有些有心無力，而黨外（黨外人士）則是有力氣卻無機會，因此，草根民眾透過日常生活，以及汙染是直接的受害經驗，進一步發展出草根拼湊的抗爭意識、草根附著的組織資源。³¹

²⁶ 編號：0208-2，時間：00:20:50-00:24:40。

²⁷ 編號：0208-2，時間：00:26:50-00:36:30。

²⁸ 編號：0217，時間：00:09:30-00:18:00。

²⁹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在臺灣的歷史形成〉，頁 195-202。

³⁰ 何明修，〈臺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1980-1986）〉，頁 98-101。

³¹ 同上註，頁 151。

以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為例，我們可以發現到，這場抗爭歷經了從黨外市長到國民黨市長的任期，其抗爭意識與組織資源，主要是以既存的農會系統、³²里民大會、³³靈安宮信仰等等社會脈絡所發展起來的。³⁴

換句話說，不只是草根民眾的身體承受著這樣的痛苦，整個搭棚抗爭的行動，也是以草根民眾作為主要的社會行動者，進而與專家學者的知識論述、黨外人士的政治資源，呈現著各自分立的狀態，它是以草根大眾的身體作為行動與論述的主體。

例如 1987 年 4 月 25 日所成立的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³⁵乃是主要扮演著專家學者的角色，強調以科學的知識來參與社區的服務，但是，正如主要成員黃提源教授所說：「有關李長榮化工廠的解決方式，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的立場，是一定要在不變更地目的情況下要求李長榮廢廠，如果李長榮變更地日後蓋了大批住宅之後，勢必會造成二次公害，我們希望在水源里、李長榮、新竹市政府三者之間找出能共同接受的方案，不能變更地日讓製造公害者得到更多利益」。³⁶

也就是說，專家學者透過知識論述，主要扮演著溝通與協調的中介者角色，他們參與的是包括了水源里圍堵李長榮 220 天說明會、³⁷環保之夜晚會（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主辦）、³⁸簡又新（環保署長）到水源里、³⁹「政府在鼓勵污染？」座談會（李長榮變更地目案）等等。⁴⁰

最為明顯的對比是，當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舉辦成立大會之際，同一個時間裡，草根民眾仍舊持續進行著圍堵行動，紀錄者在抗爭現場，一一採訪在棚內一邊作著家庭手工的中老年婦女，當搭棚抗爭的阿嬤們被問及到：「你認為說，就要自己來顧，沒法度靠那些教授？」，突然尷尬地引起一陣沉默之後，才有人應話道：「教授？……這是要怎麼講呢？」。⁴¹

³² 編號：0219-1，時間：00:20:00-00:25:00。

³³ 編號：0219-2。

³⁴ 編號：0529-2、0422-3、0423。

³⁵ 編號：0208-2，時間：00:00:00-00:19:50。

³⁶ 編號：0219-1，時間：00:25:00-00:29:32。

³⁷ 編號：0347、0348-1。

³⁸ 編號：0406、0407-1。

³⁹ 編號：0422-3、0423。

⁴⁰ 編號：0639。

⁴¹ 編號：0208-2，時間：00:21:00-00:21:30。

同樣地，所謂的黨外人士或反對黨的公職，也多是在上述場合中扮演著支持聲援的角色，例如在慶祝友誼聯誼會活動中，民進黨「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演講會」的宣傳車及遊行隊伍，行經過李長榮化工廠前，一路喊話廣播，並在看守棚前停下，為水源里民加油打氣，⁴²可見兩者之間的有所區隔。

換句話說，草根民眾意識到：「李長榮如果解散的話，我們老人家要在這裡酬神擺戲，……每次我們只要解散，李長榮就馬上復工，被騙兩三次了，它都不照約束走，……市長也幫李長榮講話，讓我們在這裡受苦，……遇到緊急時，我們就敲鑼，全村幾百人就來了，……我們老人家顧白天，年輕人顧晚上」。⁴³

「只有全村的人都來，只有這一步而已，不然還能怎麼樣？……像我從開始到現在，只有七天沒有來，幾乎是每晚來，……阮庄的人一定要覺悟，有一天如果來強制執行的話，無論怎麼樣，會死、財產沒有都不要緊，但，就是那一天要來車拼」。⁴⁴

三、身體作為媒體

最後，從身體感受的變化到身體的可見與現身，相對於專家學者的知識論述、黨外人士的政治資源，草根民眾只剩下赤裸裸、活生生的身體，可以作為表達的媒體，因此，如果在1980年代之前，草根民眾的身體，乃是作為規訓權力的對象，那麼，在1980年代之後，草根民眾的身體，就轉化成為他們與社會乃至世界發生關係的媒介物，尤其是作為抗爭的媒體。

身體作為媒體的轉化歷程，包括了草根民眾開始感受到自己「有個身體」，而且那是個能感覺、會不滿、有情緒起伏的身體，尤其是在早期環保抗爭之中，草根民眾的身體往往承受著在日常生活中因環境污染而產生的具體苦痛，進而萌生出「不平、渴望與憤怒」的感受，急欲對如此的苦痛尋求詮釋與解決辦法。

此時，草根民眾不但重新意識到身體的存在，並衍生著相應的內在感知及其意涵，包括了對於身體的重新定義，並透過共同事件的參與經驗，逐漸學習到身體的不可侵犯性，換句話說，草根民眾開始理解到這是「我的身體」，我的身體及其苦痛，並非無緣由的，它乃是來自於外力的、環境的受害，同時，也正因為這是我的身體，身體的實存化促成了主體性的生成，進一步形塑著草根民眾關於我的身體不應受到侵犯的權利意識。

⁴² 編號：0218，時間：00:23:30-00:32:30。

⁴³ 編號：0218，時間：00:43:30-00:55:30。

⁴⁴ 編號：0217，時間：00:07:30-00:09:00。

於是，我的身體採取了行動，這包括了水源里民懷疑李長榮化工以運出儲存槽之名義，欲將原料成品偷渡吊出廠區，群情激憤地到場內和工作人員理論並阻止吊掛作業，引來警察從中排解；⁴⁵新竹市政府欲拆除李長榮廠外石堆，阿婆們佔據著石堆抗議；⁴⁶李長榮違反協議，未經清大教授檢查強行運出油罐車，水源里民憤而砸破廠方玻璃，並在當天晚上於廠門口築起一道水泥石牆。⁴⁷

其後，草根民眾的身體因此成為抗爭的身體，並真正落實到「做個身體」，草根民眾積極地透過身體的傷痕展示著環境污染的苦痛，透過身體的佔據執行著長期搭棚的抗爭，透過身體的暴力表達著不受侵犯的立場，這不僅相對於政治力或知識力，乃是「純社會力」的表現，⁴⁸更可以說是以身體作為媒體的行為藝術展演。

抗爭的身體作為媒體，更進一步透過環保抗爭的共同經驗而有所互動與交流，例如鹿港反杜邦居民多次聲援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他們透過所謂的「公害之旅」，不僅在同為環保抗爭的居民之間，彼此交換並互相學習抗爭的經驗和心得，更因此建構起不要讓污染的工業來臺灣、環保單位確實執行公權力、爭取更乾淨的家園等等共識。⁴⁹

肆、媒體的身體化

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尤其是環保抗爭的紀錄影像，我們得以重新看見草根民眾的身體感受、現身可見乃至作為抗爭的媒體，同樣地，我們也不可忽略掉，綠色小組作為另類的電子媒體，亦是透過身體來施為的社會運動，這包括了紀錄的、影像的與觀看的身體，換句話說，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尤其是較有持續性地追蹤與採訪，我們不只是看見了身體如何延伸成為媒體，更是看見了媒體如何延伸著我們的身體。

一、紀錄的身體

首先，它所涉及到的就是紀錄者的身體，過去，在一個高度門檻乃至政經壟斷的媒體環境之中，誰有資源持有紀錄機器？誰有權力進行紀錄？誰能成為紀錄者？如何進行紀錄？都是受到限制與規範的，但是，由於對於主流媒體報導不實的身體感知，加上工具、技術與成本的輕便，乃至主動紀錄並進行傳播的企圖，已然改變了紀錄者的身體。

⁴⁵ 編號：0217，時間：00:47:30-00:58:00。

⁴⁶ 編號：0278。

⁴⁷ 編號：0327-2。

⁴⁸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的歷史形成〉，頁 140。

⁴⁹ 編號：0219-2、278。

正如在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中，這個完整的影像檔案，涵蓋了從 1987 年 4 月 25 日至 1988 年 7 月 26 日的紀錄時間，而紀錄者與草根民眾的身體，也共同存在於搭棚抗爭的紀錄空間，在如此同步的社會時空之中，視覺所觀看的對象與視覺本身的身體皆是共存的，草根民眾的堅持是一種抗爭，紀錄者的蹲點也是另一種抗爭。

其次，這類紀錄者身體的解放，除了影響到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紀錄者？什麼樣的事件會被紀錄下來之外，也進一步改變了紀錄者身體的姿態及其位置，也就是說，基於身體感知的不滿，紀錄者並非代表權力或菁英的局外人，他們的眼睛也並非帶著限制與規範的視覺，他們的身體更往往是與草根民眾的身體共存在同一個社會時空之中。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在某一次的圍廠行動中，李長榮協理林達聰控告被水源里民溫火木、郭國源毆打，在新竹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時，數十位的水源里民到場聲援，法庭內，旁聽的村民聚精會神地聆聽李長榮員工陳述被毆經過，而紀錄者處於與里民相同的位置，儘管無法取景、收音不佳，仍舊抱著開機狀態的攝影機進行紀錄。⁵⁰

第三，此時的電子攝影機，作為另類的媒體，不只是紀錄者的另類，或者是紀錄內容的另類，更重要的是它如何作為紀錄者身體的延伸，相對於其他的媒體形式，例如同一時間進行報導的文字工具（《自立晚報》、《人間雜誌》），不僅存在著閱讀理解的門檻，也局限於視覺認知的延伸，而電子攝影機，則得以延伸視覺、聽覺或觸覺等等不同的感官面向，進而作為某種真實的再現。

正如在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中，在抗爭的過程裡，綠色小組不僅忠實地報導了特定活動、人物採訪、抗爭事件或問題座談之外，至少還可看出在 1987 年 5 月 2 至 3 日與 5 月 11 至 14 日期間，他們幾乎是 24 小時與被攝者同在第一線，用局內人（而不僅是局外的報導人）的視線了解抗爭，並進一步有所互動。

換句話說，透過電子攝影機，不只是延伸了紀錄者乃至我們的感官，進而作為某種真實的再現，透過長時間的紀錄、同一空間的互動，進一步讓我們意識到電子攝影機背後的身體，作為生理基礎，如何使得我們的視覺得以運作。

二、影像的身體

此外，它還涉及到的就是影像的身體，或者說是被攝者的身體，過去，由於上述紀錄及其紀錄者的壟斷及其限制，主流媒體更是透過影像文本的再現真實，在我們的眼睛和視覺之間，確定了眼見為憑、再現即真實等等看似客觀的對應關係，或者是通過建立一種視覺的典範，去限定我們作為觀看者的位置及其觀看方式。

⁵⁰ 編號：0262，時間：00:05:18-00:14:20。

然而，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我們可以發現到，紀錄者採取了觀察（Observational）、互動（Interactive）或參與（Participatory）的模式，⁵¹前者乃是以現場收音替代了事後旁白，強調以不介入的方式觀察事件或人物的發生過程，後者乃是再現了作者的現身、互動與參與等等角色。

也就是說，紀錄者以其主觀的眼睛，而非有所規範的視覺，身處其中、同步紀錄著草根民眾的抗爭過程，也就是說，它擺脫了固定點的定向視覺，而走向了多點、不連續、不規則、差異的流動觀看，也正是因為如此，更進一步在影像文本之中，真實再現了草根民眾的身體。

正如在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裡，紀錄者身處在草根民眾之中，在陪伴其搭棚抗爭的過程裡，⁵²透過紀錄者的主觀視覺，我們看到的不是政治人物、專家學者，甚至並非領導人物、衝突現場，而是草根民眾的身體及其日常生活。

這類草根民眾的身體及其日常生活，我們可以編號 0217 的紀錄影像為例，它完整地呈現了草根民眾在看守所內所渡過的一天一夜：

從天亮開始，阿婆們陸續繼續來到看守所「上工」，守夜的村民陸續起床，或折棉被、或準備早餐，⁵³把看守的任務交接給阿婆們；之後，水源里的阿婆們，就坐在看守所內，或作家庭手工、或話家常、或作麻糬；⁵⁴接近傍晚時，一位阿婆的兒子抱著大西瓜來，阿婆趕緊切開給大家分享，小學生放學經過，捧著阿婆給的西瓜回家；⁵⁵到了傍晚，守夜的男性們再作輪班，村民、阿公與小孩在棚裡乘涼、聊天與看電視，⁵⁶整個夜裡，或吃麻糬、或下棋、或煮宵夜、吃宵夜、或乘涼、或拉胡琴、唱北管。⁵⁷

相對於過去的或其他的異議媒體形式，⁵⁸較為侷限於單一感官的延伸（無論是文字或聽覺），另類的電子媒體，透過紀錄影像再現著草根民眾的身體，進一步傳達著不同版本的身體性，使得我們能夠更進一步掌握草根民眾沒有被呈現、被文字表達化的聲音與感受。

⁵¹ Bill Nichols,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Bill Nichols,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⁵² 編號：0217、0218、0219-1、0219-2、0220、0443-2。

⁵³ 編號：0217，時間：00:17:58-00:32:32。

⁵⁴ 編號：0217，時間：00:42:42-00:58:20。

⁵⁵ 編號：0217，時間：01:42:38-02:02:33。

⁵⁶ 編號：0217，時間：00:06:29 - 00:09:31。

⁵⁷ 編號：0217，時間：01:16:18 - 01:41:32。

⁵⁸ 馮建三，〈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臺〉，《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0 期（1995 年），頁 177-234。

透過上述草根民眾的日常生活之紀錄影像，我們看到、聽到並感覺到他們的身體感受，包括了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展示著受苦的身體，包括了因灌溉水受汙染而導致皮膚病的老農，紀錄者以鏡頭特寫他們腳底的龜裂、紅腫，以至於不得不塗抹各種藥品；⁵⁹而阿嬤更泣述著孫女如何因毒水、毒氣污染，年僅 25 歲就生病罹癌去世了。⁶⁰

也包括了因受害的身體而帶來的生活的改變，住家的門窗用膠帶將縫隙封死，以避免惡臭廢氣進來，水龍頭的塑膠管，管內壁都是黑色；⁶¹村民只能騎著機車，後座綁著塑膠桶，到車程 10~15 分鐘遠的砂石場地下水井去載乾淨的水。⁶²

而透過訪談更進一步突顯著素樸草根的抗爭意識，「我們老人是沒關係，子孫喝這種水可以嗎？」，⁶³「我們不是爲了要李長榮的錢，是爲了生命問題，是爲了代代子孫」，⁶⁴「沒有爲人民的生命權設想，沒有人民、哪來的國家」。⁶⁵

三、觀看的身體

進一步言之，它更涉及到的就是觀看者的身體，儘管，McLuhan 從媒體即訊息的觀點出發，⁶⁶進一步依據媒體自身的資訊飽滿程度與使用者參與程度，作了熱（hot）媒體與冷（cool）媒體的區分，前者如廣播、電影，係以「高解析度」延伸某一個單一感官（聽覺、視覺），呈現被資料數據全然充滿的狀態，造成使用者參與程度較低，後者則如電話、電視，屬於低解析度、參與程度高的媒體。

然而，McLuhan 也注意到了媒體之間的混種結合，⁶⁷如何孕生了能量與變遷的激烈釋放，這包括了因媒體混種而造成的某些影響，或者說，一媒體被另一媒體交互滲透之下所帶來的結果，也就是說，媒體交會之後衍生的新的形式，作爲我們感官的延伸，設立了新的比率，且不只我們私感官之間的比率變了，當媒體本身一有互動，它們之間的比率也因此改變。

換句話說，透過不同媒體的組合、混種或相會，不僅改變了媒體的既有屬性，衍生了新的形式，也將使得觀看者的身體，從習慣於既有媒體形式的昏昏麻痺之中，轉而發展出一種新的感知，其自主權和生產性，可能作爲個體自由與重獲釋放的基礎。

⁵⁹ 編號：0217，時間：00:00:10-00:06:27；編號：0262，時間：00:14:52-00:16:41；編號：0218，時間：01:23:00-01:39:30。

⁶⁰ 編號：0218，時間：01:11:04-01:17:44。

⁶¹ 編號：0218，時間：01:48:00-02:00:00。

⁶² 編號：0220，時間：01:05:30-01:17:30。

⁶³ 編號：0208-2，時間：00:20:40。

⁶⁴ 編號：0217，時間：00:19:30-00:58:00。

⁶⁵ 編號：0208-2，時間：00:23:40。

⁶⁶ Eric McLuhan，鄭明萱譯，《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⁶⁷ 同上註。

以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為例，我們即可看到類似這種媒體之間的組合、混種或相會，如何改變了媒體的既有屬性，乃至不同媒體之間的比率關係，甚至是因此讓觀看媒體的身體「動」了起來，觀看者及其身體，產生了新的感知、自主性與生產性。

首先，綠色小組將電子攝影機的紀錄工具、新聞紀錄的影像形式配合出現在各種不同觀看場所的錄影帶（可能是家庭裡的電視、服務處的電視牆、抗爭集會的屏幕等等）作了重新的組合，不僅改變了主流媒體電視新聞的既有屬性，並混雜了不同媒體的特殊性質（電視、電影與錄影帶）。

例如由於多是以錄影帶的形式而非電視新聞的形式進行流通，因此，在家庭播放錄影帶，改變了電視作為冷媒體的性質，反倒接近觀看一部資訊飽滿的電影，而在服務處或在抗爭集會以電視牆或屏幕播放錄影帶，則改變了電影作為熱媒體的性質，反倒接近觀看一部參與程度高的電視。

其次，透過觀看者的觀看實踐，及其所傳達的訊息內容，它也改變了媒體如何作為我們感官的延伸，也就是說，這類媒體之間的混種與相會，不只是延伸了特定的感官，或者改變了感官的比例，它其實是透過媒體延伸了我們整個的身體，包括了聽覺、視覺、中樞神經系統，還有活生生的肉體。

無論是購買錄影帶回家播放觀看，或者前往公職人員服務處共同觀看，或者因為聲援抗爭而集會觀看，這類觀看的實踐過程，都是必須以身體的移動作為先決條件，換句話說，這也連帶使得觀看者的身體衍生了主動性，並透過這個觀看的實踐過程，同時表達著觀看者的自主性與生產性。

最後，上述觀看者身體的改變，更進一步地促成了社會關係的互動與聯繫，例如我們在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中所見的，在新竹水源里居民長期遭受李長榮化工排放污染之害，忍無可忍、自力救濟，包圍李長榮達 220 天後，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特別舉辦李長榮事件說明會，各地環保團體人士前來聲援。

就在水源里圍堵李長榮 220 天說明會上，草根民眾或坐或站，透過現場綠色小組社運影帶《我愛後勁、不要五輕》的放映，⁶⁸不僅作為相互聲援的力量，也是建構共同抗爭的意識，此一觀看的經驗，混雜了電視新聞、電影屏幕與群眾集會等等不同的媒體形式，而身體的現身及其主動，則呈現在觀看的實踐之中。

⁶⁸ 編號：0347，時間：00:05:10-00:06:49。

伍、結語

以 1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而言，其中的綠色小組，無疑具有一個特殊性的位置，包括了弱勢的立場、長期的紀錄與影像的完整等等特色，而更重要的是，被保存並維護下來的社運影帶，它作為紀錄影像的研究資料，亦具備有歷史的見證、集體的記憶與影像的檔案等等意義。

同時，關於 1980 年代的另類電子媒體雖已多所討論，但主要聚焦在結構的條件、生產的形式與異議的內容，然而，它作為社會運動風潮的一環，不應只是再現社會運動的真實，也應該從它作為「媒體」的社會運動來加以理解，尤其是它如何形塑新的媒體形式，乃至建構新的社會關係。

因此，本文透過綠色小組的社運影帶（完整的影像資料庫而非編輯的錄影帶作品），尤其是作為早期環保抗爭範例的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共計 20 項、從 1987 年 4 月 25 日到 1988 年 7 月 26 日的紀錄影像，內容涵蓋了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抗爭歷程，以進一步拓展上述面向的理解。

首先，透過早期環保抗爭的經驗資料，社會運動的研究論述已注意到身體感受的變化，如何作為社會力的文化根源，同時，也釐清出草根民眾如何作為行動與論述的主體，而透過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我們更發現到，從有個身體、我的身體到做個身體，草根民眾乃是逐步將身體轉化成為抗爭的媒體。

其次，正如身體在社會運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麼，另類電子媒體作為社會運動，也是同樣透過身體來施為的，它更因新的媒體形式，延伸著我們的身體，並改變了我們的社會關係，而透過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的紀錄影像，即是紀錄者身體的改變、被攝者身體的再現、觀看者身體的主動等等特殊性質。

然而，從 1980 年代至今，環境運動逐漸由肢體抗爭（1980-1986 年）（身體的現身、人員的聚集、肢體的力量、身體的犧牲），慢慢轉變成遊行示威（1986-1993 年）（身體的現身、指揮者的身體），再轉變成專業遊說（1993 年之後）（由專家的身體取而代之），草根民眾不僅逐漸失去行動者的地位，其「身體更逐漸失去能动性，組織甚至是組織裡的專家才是真正的行動者，專業的知識變成社會行動的合理性基礎」。⁶⁹

⁶⁹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轉化：臺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頁 110-111。

因此，它即是一個草根民眾的身體從不可見、現身到隱退的過程，象徵著社會力的馴化，它就離國家和經濟愈近，而離社會愈遠，社會力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就逐漸消失了；⁷⁰或者說是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尤其是在民主化的階段（1993-1999年），導致了抗議處理的例行化、環境參與機制的不開放、舊政治聯盟者的轉型等等現象。⁷¹

如果身體的媒體化，日益轉化成為身體的馴化或制度化，那麼，媒體的身體化，也同樣伴隨著這個變遷的過程而有所馴化或制度化，儘管，因著工具、技術與成本的更加輕便，紀錄者的身體也日益地普及與多元，然而，由於紀錄者大多進入消費、雇用或影展的既定關係之中，其身體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反而更加受到規範。

而被攝者的身體，尤其是草根民眾的身體，雖然也因為紀錄者日益普及與多元的影響，看似得以不斷地現身並被看見，但是，在某種消費、雇用或影展的既定關係之中，或者作為商品，或者作為宣導，或者作為競賽，卻也難免不時淪於身體的奇觀，它所指向的往往不再是身體的集體行動，而是透過奇觀的影像，讓我們更加趨向於個別化。

至於觀看者的身體，儘管，諸多另類媒體乃至社運團體，仍然透過各種方式，尤其是影像的紀錄，企圖進行社會議題的建構，並提供一個新的外在世界的認知圖像，然而，卻由於過度關注在社會運動的報導或異議內容的傳達，反倒忽略了創造新的媒體形式，或者不同媒體形式的組合，方有創新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那麼，相對於國家治理與市場經濟的社會力量要如何重新動起來？透過上述身體媒體化乃至媒體身體化的檢視與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到，面對身體的馴化或制度化，或者在權力的身體與消費的身體之外，⁷²重新找回社會的「身體」，乃成為主要的努力方向，尤其是對於另類媒體（紀錄影像）的未來實踐而言。

也就是說，媒體，不應只是內容的載體，或者是一面「鏡子」，透過它在形式上的革新，例如在國家的政策與市場的趨勢之外，如何不將媒體視為實踐某種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是將媒體自身就當作實踐解放的事件或對象，並與其他類型的身體實踐進行連結，自主性地組織實踐媒體的方法與進程，不僅可能藉此改變並轉化媒體與身體的關係，也可能才是促進社會變遷的力量。

⁷⁰ 李丁讚、林文源，〈社會力的轉化：臺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頁 112-115。

⁷¹ 何明修，〈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頁 262-267。

⁷² 齊偉先，〈權力的身體與消費的身體—以身體為媒介的考察〉，《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5 期（2008 年），頁 89-142。

airiti

如果由此再進一步反省到臺灣紀錄片的經驗研究，那麼，除了作者論的取向（創作的理念），以及文本美學的面向（敘事的結構）之外，關於紀錄者是如何實踐紀錄影像作為一種媒體的歷程，就成為亟待開發的議題，同時，要理解這個歷程，除了透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之外，它也就更加突顯紀錄影像的視聽檔案（不只是紀錄片作品）作為研究資料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 李丁讚、林文源, 2000, 〈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臺灣的歷史形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8: 133-206。
- _____, 2003, 〈社會力的轉化：臺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2: 57-119。
- 何明修, 2001, 〈臺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 (1980-1986)〉,《臺灣社會學》2: 97-162。
- _____, 2003, 〈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 (1993-1999)〉,《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0: 217-275。
- 林美娜, 1987, 〈還我一瓢清淨水：記水源里與李長榮化工的抗爭〉,《人間》19: 22-47。
- 馮建三, 1995, 〈異議媒體的滯留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臺〉,《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77-234。
- 郭力昕, 1992, 〈跳出小眾媒介的困局—兼論社運與媒體的矛盾關係〉,收於敦誠等著,《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臺北：唐山,頁 127-131。
- 敦誠等著, 1992,《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臺北：唐山。
- 敦誠, 1992, 〈「小眾媒體」是什麼？由四個國外的實例省視本地的狀況〉,收於敦誠等著,《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臺北：唐山,頁 3-19。
- 張茂桂, 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國策中心。
- 賀照緹, 1993,《小眾媒體、運動文化、權力：綠色小組的運動形式及生產條件分析》,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素霞, 1994,《臺灣社會運動與另類影帶之研究 1986-1992》,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齊偉先, 2008, 〈權力的身體與消費的身體 - 以身體為媒介的考察〉,《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5: 89-142。

蕭新煌（魏書娥採訪整理），1991，〈挫折與轉進—訪蕭新煌教授談兩年來的臺灣社會運動〉，《中國論壇》32（2）：58-61。

戴伯芬、魏吟冰，1992a，〈臺灣反主流影像媒體的歷史觀察〉，《電影欣賞》57：45-51。

_____，1992b，〈臺灣反主流影像媒體的社會觀察—從拍攝內容分析談起〉，收於敦誠等著，《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臺北：唐山，頁 43-52。

McLuhan, Eric & Frank Zingrone 輯，1999，〈預知傳播紀事：麥克魯漢讀本〉，臺北：臺灣商務。

McLuhan, Eric 著，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臺北：貓頭鷹。

Nichols, Bill. 1991.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_____，2001.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